

澳门青年的政治参与研究：社会分层、社会流动与教育的视角

龙海涵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社会分层、社会流动与教育如何影响澳门青年的政治参与行为，这是本文研究的问题。通过澳门青年指标 2016 社会调查的数据分析，发现澳门青年政治参与行为存在明显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差异；而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因素对不同类型的政治参与行为影响是不一样的；通过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教育对澳门青年政治参与行为存在多重的影响。

关键词：青年；政治参与；社会分层与流动；教育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港澳地区的青年社运增多，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议题和研究问题。这些激烈的社会运动表面上是各种政治势力展开的政治较量，深层问题则源于国际、内地和港澳环境变化所衍生出的诸多问题（刘兆佳，2015），因此分析相关议题需要有社会、经济与政治的视角（郑宏泰、尹宝珊，2014）。另外，港澳青年的社运从发生时间和形式上与全球性的青年社运密不可分，全球性的分析框架对理解港澳青年对时政的态度也显得很有价值（王丹凝，2016）。国外关于近年全球青年社会运动的研究，部分集中在探讨青年的不公平感（Matthiesen, 2012; Bellei et al., 2014）、对政府部门的失望（Guzman-Concha, 2012; Barsoum, 2013; Clarke, 2013）等负面政治态度对青年参与社会运动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强调这种个人的情绪和态度更多是与社会环境相关（Helen Stokes et al., 2015），在新经济体系中青年的工作不稳定和失业更为严重（Andy Furlong, 2015），高失业率和高房价是导致青年走上街头的重要原因（Alsayed, 2014）；教育市场化倾向导致的教育政策

失败（Haveman and Smeeding, 2006; Guzman-Concha, 2012; Bellei et al., 2014）也增加了青年被动员的机会。总之，青年的社会运动不是由单一因素所造成的，而是受社会经济发展、个人家庭经济、青年政治地位、政府对青年的态度等诸多因素共同影响的（Shafiq, 2014）。

强调结构性要素对行为的影响是港澳青年社会运动研究的主要范式，以往研究所涉及的结构性要素主要包括社会分层、社会流动、教育与媒体等，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首先，以往研究大部分都是从单一的层面去解释，少见综合性的分析框架，对不同结构性变量之间相互影响机制探讨较少。其次，对青年政治参与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激烈的社会运动，较少讨论其他形式的政治参与行为。有实证研究数据表明，真正参与上街游行的青年在整个青年群体中并没有占太大的比例（郑宏泰，2016），青年除了激进的街头运动以外，还有其他形式的政治参与行为。最后，关于社会阶层和社会流动的分析主要集中在讨论相对弱势的群体，少见对不同阶层和社会流动状态群体的比较研究。基于上述理由，本文试图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量化数据，建立一个包含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和教育在内的对青年政治参与行为的综合性分析框架。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思路

赵鼎新曾将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结构性要素概括为变迁、结构和话语，并且认为每一种要素的分析都对应一种社会学分析传统（赵鼎新，2005）。在回顾有关香港青年社会运动的研究时，赵永佳和叶仲茵将之为“上位论”/“下流论”和“价值观念”两种类型（赵永佳、叶仲茵，2015），其分类的实质也就是“结构的解释”和“文化的解释”两种社会学基本的分析范式。

“结构的解释”中最为常见的是强调社会流动的影响，即客观或主观社会流动状况对港澳青年政治行为和政治态度的影响。社会流动对港澳青年社会运动影响的解释主要有两种路径，即“上位论”和“下流论”（赵永佳、叶仲茵，2015）。“上位论”的观点认为，青年参加社会运动是源于其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由此产生不公平感进而上街抗争。“下流论”强调无论在客观或主观层面，现今一代香港青年普遍经历“下流”的情况，而这正是近年青年积极参与社会运动的原因。

将结构的分析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段进行就会形成接近赵鼎新所言“变迁”的分析思路，具体表现为两类不同关注点的研究。一类研究强调不同世代所处的社会环境是不同的，如吕

大乐在《四代香港人》（吕大乐，2007）中所言的“世代论”。这种观点认为由于所处社会环境的差异，香港年轻与年长世代在道德价值、思想逻辑和行为习惯上都有明显的差别，彼此间难免出现矛盾，甚至形成“世代之争”。年轻一代的香港人不一定比他们的父辈更为激进或反叛，只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要求他们更快地接受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另一类强调变迁的研究则将港澳放在整个区域经济的背景下讨论宏观环境的变化对青年社会运动的影响，其主要分析港澳和内地的关系。近年来港澳和内地在经济地位上的角色发生了巨大变化，香港经济愈来愈依赖内地，只有中产人士从中得益，低技术劳工则失去工作机会并被边缘化，造成获利和损失者之间的冲突，矛盾日益政治化（郑宏泰，2016）。吕大乐（2013）也指出，尽管香港整体经济受惠于内地经济起飞，港人也有机会到内地工作，但这些机会并非是对所有人群开放，相反呈现出渐趋狭窄的趋势。两地整合的新形态以及机会结构的转变，扩大了港人现实与期望之间的落差，这是香港部分年轻人对区域融合产生焦虑的原因之一。也有研究者关注到个人游计划对香港青年政治态度和社会运动的影响，认为个人游计划虽然有利于旅游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但也因步伐太快而引发连串社会民生问题，引起部分市民尤其年轻人的不满，他们要求捍卫本土，反对与内地的联系与融合（郑宏泰、尹宝珊，2014）。

“文化的解释”概括起来大体上有三种解释路径。第一种是后物质主义理论。英格尔哈特认为当社会逐渐富裕以后，人们会从原来的“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英格尔哈特，2013：149）。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香港青年大多在安稳与富裕的时期成长，其态度会比较倾向后物质主义，即更热衷追寻包括自主自由、自我实践、社会公义、政治参与、民主社会、环境保育等价值，并由此会导致一种新的政治形态的出现（Wong and Wan, 2009）。赵永佳的研究指出，相比于对自身发展机遇的不满，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青年激烈言行的影响更大（Chiu, 2015；赵永佳、叶仲茵，2015）。

文化的第二种解释路径是强调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的淡薄是导致青年社会运动产生的原因。对香港学生进行的追踪研究数据表明，尽管在回归后香港青年国家认同总体上有所提升，但是认同度还是偏低（陈丽君，2014；涂敏霞，2014；刘争先，2014）。虽然香港人对于“中国人”的认同在上升，但认为自己是“香港人”的仍然占多数（郑宏泰、尹宝珊，2014）。香港青年国家认同意识淡薄以及本土意识的兴起是特定历史条件和历史机遇的产物（邢立军、徐海波，2014）。由于曾受英国殖民统治，香港在政治、经济及社会等层面走上与内地不同的发展道路，孕育了本土文化与身分认同。回归后中央政府考虑到香港的特殊历史因素，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虽然使香港可以继续发挥优势，但同时也维持了独有的

本土文化与身分（郑宏泰、尹宝珊, 2014）。

文化的第三种解释路径集中讨论港澳教育体系对青年社会运动的影响,认为教育制度本身的问题促进了青年的社会运动。港澳教育界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向学生灌输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理念（陈丽君, 2014），同时又多以西方的现代性理论体系为基础。有心理学研究表明,重视现代性的学生更倾向于认同自己是香港人,或者先是香港人其次才是中国人;而重视中国文化价值的学生则更倾向于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或首先是中国其次才是香港人（Lam et al., 1999）。

通过上述文献综述,我们发现已有研究强调了一系列影响港澳青年社会运动的因素。从研究的主题上看,大部分集中在验证某个单一因素对青年社会运动的影响,少见讨论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赵鼎新认为每个导致社会运动产生的因素都是一个包含许多低层机制的复合机制,每个因素都可能启动其他因素机制从而导致社会运动的产生（赵鼎新, 2005）。如果不把不同因素综合起来考虑,或许就无法厘清某个因素对青年社会运动影响的具体机制。基于上述理由,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了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和教育三个重要的变量,通过量化数据的分析探讨他们对青年社会参与行为的影响。

理论上影响政治参与行为的因素包括动机（态度）和资源两个层面。以往的文献主要强调不满是青年政治参与的动因,我们可以假设处于较低社会阶层地位和社会流动状态较差的青年政治参与的概率会更高。政治参与还涉及到资源的问题,处于较高社会地位的青年逻辑上应该拥有更多的资源,因此在这个逻辑上社会分层和流动状态的提升也有助于提高青年政治参与的概率。并且这两种动因所导致政治参与行为的类型可能是不一样的。

教育的影响也是许多研究聚焦的问题,从逻辑上讲教育的影响应该是多重的。李颖晖（2015）在分析教育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时提出“结构地位决定论”和“相对剥夺理论”两条基本解释路径。沿此思路,我们假设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是影响青年政治参与行为的原因之一,那么教育的影响也应该存在多重路径。首先教育作为一种资源可以通过提升青年的社会地位和改善社会流动状况从而影响青年的政治参与行为,且这种影响是正面的。其次,教育也给予青年的一种回报期望,一旦教育的实际收益达不到预期,由于期望的落空教育也会对青年的政治参与行为产生影响,且这种影响是负面的。这两种影响都是通过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来实现的,因此引入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变量有助于分析教育对青年政治参与行为的具体影响机制。

基于上述的思路,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

问题一: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流动状态的青年是否有着不同的政治参与模式?

假设 1:处于较高社会阶层地位的青年参与体制内和温和政治行为的概率更高;处于较低社会阶层地位的青年参与体制外和激进政治行为的概率更高。

假设 2:社会流动状况较好的青年参与体制内和温和政治行为的概率更高;社会流动状况较差的青年参与体制外和激进政治行为的概率更高。

问题二:教育对青年政治参与的影响是否存在前文所述的多重影响机制?如果存在这种多重影响机制,在控制了收入、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等因素后,教育对青年政治参与的积极效应会减弱。

假设 3:在控制了社会分层的因素后,教育对体制内和温和政治参与发生概率的正向影响会减弱,对参与激进政治行为发生概率的正向影响会增加。

假设 4:在控制了社会流动的因素后,教育对体制内和温和政治参与发生概率的正向影响会减弱,对参与激进政治行为发生概率的正向影响会增加。

问题三:教育的影响对不同阶层和社会流动状态的青年而言是否存在不同的模式?如果教育对青年政治参与存在消极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通过相对剥夺感产生的,那么在社会阶层地位较低和社会流动状态较差的青年群体中这种影响应该更为显著。

假设 5:教育对参与激进政治行为发生概率的正向影响在社会阶层地位较低的青年群体中更为显著。

假设 6:教育对参与激进政治行为发生概率的正向影响在社会流动状况较差的青年群体中更为显著。

问题四:教育体系本身对青年政治参与行为是否有影响?

假设 7:如果教育体系本身对政治行为的消极影响是存在的,文科教育对政治行为的消极影响要大于理工科教育。

二、数据、变量和分析方法

(一) 统计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澳门青年指标 2016 社会调查。该调查的调查对象为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青年人,年龄介乎于 13-39 岁,其中包括中学生、大学生以及在职等不同的青年群体。调查主要通过自填式问卷和电话访问两种方式进行,共获得样本 2483 个。¹ 由于本研究关注的是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对澳门青年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因此只保留了样本中在职青年的部分,实际进入分析的样本量为 1301 个。

(二) 变量设计

1、因变量

本文研究的因变量为澳门青年的政治参与行为。熊美娟认为政治参与这个概念并没有被严格的定义,大体上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界定:第一类是将政治参与看成是公民对政治活动、政治治理、政府制定政策过程的参与,主要强调公民对政治、政府活动的参与;第二类是将政治参与的对象限定为除了政治、政府活动外对社会共同活动的参与,这类社会活动包括社团活动、志愿活动等(熊美娟:2016:60-61)。本文将上述两类政治参与行为都纳入到分析之中。

就具体的政治参与形式,不同学者也有不同的分类。亨廷顿将政治参与分为选举活动、游说、组织活动、接触、暴力(亨廷顿:1989:30-54)。黄湛利根据港澳地区的政治特点将政治参与分为选举活动、组织活动、接触和暴力四个大类(黄湛利,2009:21)。熊美娟则将澳门居民政治参与的行为区分为参加社团、参与社会运动、接触公职人员、接触媒体、参与政府咨询活动等几类(熊美娟:2016:62)。本文根据澳门青年指标 2016 社会调查所涉及的问题,按照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温和到激进的思路将澳门青年社会参与行为分为选民登记、参加民间组织、间接表达意见和直接表达意见四类。由于在样本中参与过社会运动的青年人数较少,本文将参与社会运动纳入到直接表达意见这一类政治参与行为之中。选民登记使用的是“你有没有登记成为选民”这个问题来测量,如有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参加民间组织、间接表达意见和直接表达意见分别使用过去“过去 12 个月内,你有多常参与民间组织/社团”、过去 6 个月内“有否参与间接发表意见”、“有否参与直接发表意见”和“有否参与集体/社会运动”等问题来测量,如有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

2、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包括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和教育。

¹ 详见圣公会澳门社会服务处:《“澳门青年指标 2016 社会调查”报告书》,第 7-10 页。

社会分层的研究主要分为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韦伯的分层理论两大传统,分别使用经济地位和资产所有权以及职业地位作为社会分层的依据,典型的分层模型包括赖特的阶级分类模型和戈德索普的阶级分类模型(李强,2011:189)。基于上述两个分类模型,不同学者根据研究需要对港澳社会的分层结构进行了不同的划分,如吕大乐和黄伟邦的三阶级七职业层级结构(吕大乐、黄伟邦,1998:242)、黎熙元的三阶级六阶层结构(黎熙元,2008:103)、郑宏泰的五大社会阶层分类(郑宏泰,2016)。本文按照职业将澳门青年分为“雇主、机构行政人员及从业人员”、“技术工人、文员及自雇人士”、“服务性行业雇员”、“非技术工人”,再参照郑宏泰(郑宏泰,2016)的分类方式以月薪30000港币为界限将“雇主、机构行政人员及从业人员”区分为“高薪雇主、机构行政人员及从业人员”和“非高薪雇主、机构行政人员及从业人员”,建构起一个五分类的社会分层体系,其中“高薪雇主、机构行政人员及从业人员”和“非高薪雇主、机构行政人员及从业人员”属于服务阶层,其他三类属于劳工阶层。

社会流动的测量主要使用代际流动的主观测量法,使用一个问题测量:相对父母那辈,你认为你现时的社会阶层状况是?备选答案有“提升”、“不变”、“下降”三项,根据被访者的回答将其区分为“阶层地位不变”、“阶层地位上升”、“阶层地位下降”三种社会流动状态。

教育程度则分为“没受过高等教育”、“受过理工科专业高等教育”、“受过文科专业高等教育”三类。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被访者的性别、年龄、出生地(分为“澳门本地出生”和“非澳门本地出生”)、婚姻状况(分为已婚和未婚)、个人月收入。由于个人月收入分布呈偏态性,本文对月收入进行对数处理。

(三) 分析方法

本文的分析单位是澳门青年的个体行为,我们不仅假设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会对澳门青年的政治参与行为有影响,还会对其他因素对政治参与行为的作用机制产生影响,即同一子群体的青年可能会受到共同群体因素的影响,故采用多层logistic模型(multilevel logistic model)。具体而言,使用的是随机系数模型。

在分析策略上,先建立教育对青年政治参与行为影响的一元回归模型。接着建立一个只包含社会分层或社会流动变量的两层完全无条件模型,探讨社会分层或社会流动对青年政治

参与行为的影响。第三个模型则在模型二的基础上加入教育的变量，通过和模型一的对比可以探讨社会分层和流动对教育影响机制的作用。第四个模型则加入其他控制变量。

三、实证结果分析

表 1 不同政治参与行为的基本分布状况

		选民登记的人数 (比例)	参加民间组织的 人数 (比例)	间接表达意见 的人数 (比例)	直接表达意见 的人数 (比例)
社会 分 层	高薪雇主、机构 行政人员及从业 人员	95 (77.24%)	39 (31.7%)	18 (14.63%)	18 (14.63%)
	非高薪雇主、机 构行政人员及从 业人员	418 (76.70%)	208 (37.89%)	47 (8.56%)	59 (10.75%)
	技术工人、文员 及自雇人士	169 (60.57%)	67 (23.67%)	16 (5.65%)	25 (8.83%)
	服务性行业雇员	106 (63.10%)	49 (29.17%)	7 (4.17%)	17 (10.12%)
	非技术工人	39 (63.93%)	23 (36.51%)	4 (6.35%)	4 (6.35%)
社会 流 动	阶层地位不变	350 (72.92%)	167 (34.65%)	40 (6.91%)	45 (7.77%)
	阶层地位上升	402 (70.03%)	179 (30.92%)	38 (7.88%)	59 (12.24%)
	阶层地位下降	122 (62.24%)	59 (29.80%)	15 (7.58%)	24 (12.12%)
总体		899 (69.64%)	419 (32.21%)	97 (7.46%)	132 (10.15%)

表 1 至表 3 是样本政治参与行为各测量指标的描述统计及差异分析。我们先看青年政治参与行为在社会分层上的差异。结果显示，在选民登记和间接表达意见这两个维度，总体上处于服务阶层的青年发生的概率要显著地高于劳工阶层。在参加民间组织上，大体上呈现出服务阶层和下层青年发生的概率高，中间阶层发生概率低的结构。在直接表达意见上，“技术工人、文员及自雇人士”和“非技术工人”发生的概率要显著地低于其他阶层。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处于较高社会阶层地位的青年参与体制内和温和政治行为的概率更高，假设 1

的前半部分得到了验证。但是在体制外和激进政治行为发生的概率上，处于较高社会阶层地位的青年整体上依然高于社会阶层地位较低的青年，假设 1 的后半部分没有得到验证。

接着分析青年政治参与行为在社会流动上的差异。结果显示，在选民登记上，认为自己阶层地位上升和不变的青年其发生的概率要大于认为自己阶层地位下降的青年。在参加民间组织和间接表达意见的行为上，不同社会流动状态的青年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异。认为自己阶层地位上升和下降的青年发生直接表达意见行为的概率要高于认为自己阶层地位不变的青年。归纳起来，假设 2 的前半部分得到了验证，社会流动状况较好的青年在体制化的政治参与行为（选民登记）上参与的概率更高，但在体制外和激进政治行为发生的概率上，认为自己阶层地位上升的青年并没有显著地低于其他群体，只有认为自己阶层地位不变的青年其发生的概率要低于其他群体，假设 2 的后半部分没有得到验证。

表 2 不同社会阶层地位青年政治参与行为的差异分析

	高薪雇主、机构行政人员及从业人员	非高薪雇主、机构行政人员及从业人员	技术工人、文员及自雇人士	服务性行业雇员
非高薪雇主、机构行政人员及从业人员	III	--	--	--
技术工人、文员及自雇人士	I II III IV	I II	--	--
服务性行业雇员	I III	I II III		--
非技术工人	I III IV	I		

注：I 表示两者在选民登记发生的概率上差异是显著的（ $P<0.1$ ）；II 表示两者在参加民间组织发生的概率上差异是显著的（ $P<0.1$ ）；III 表示两者在间接表达意见发生的概率上差异是显著的（ $P<0.1$ ）；IV 表示两者在直接表达意见发生的概率上差异是显著的（ $P<0.1$ ）

表 3 不同社会流动状态青年政治参与行为的差异分析

	阶层地位不变	阶层地位上升
阶层地位上升	IV	--
阶层地位下降	I IV	I

注：Ⅰ表示两者在选民登记发生的概率上差异是显著的（ $P<0.1$ ）；Ⅱ表示两者在参加民间组织发生的概率上差异是显著的（ $P<0.1$ ）；Ⅲ表示两者在间接表达意见发生的概率上差异是显著的（ $P<0.1$ ）；Ⅳ表示两者在直接表达意见发生的概率上差异是显著的（ $P<0.1$ ）

表4是澳门青年参加选民登记的模型结果。模型1的一元回归结果显示，教育对澳门青年参加选民登记的概率有显著影响，受过理工科专业高等教育的青年参加选民登记的概率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青年的1.53倍¹，文科和理工科专业教育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即高等教育会显著地提高青年参加选民登记的概率，同时假设7在选民登记上没有得到验证。模型2和模型5分别为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效应的两层完全无条件模型，从中可以看到总体方差中分别被不同层次所解释的部分。模型2显示社会分层解释的方差是0.3133，rho值为0.029。模型5显示社会流动状态差异解释的方差是0.0197，rho值为0.0059，且该值并没有显著地不等于0。

表4的模型3和模型6加入了关于教育的变量，模型4和模型7加入了年龄、性别、出生地、婚姻状况、收入等变量。模型3显示加入了社会分层变量后，教育对参加选民登记概率的提升作用变得不再显著，表明高等教育的正向影响至少有一部分来自于其提高了个人进入社会上层的概率，假设3在选民登记这个行为上得到了验证。模型6加入社会流动变量后教育的作用依然显著，假设4没有得到验证，但模型7加入收入变量后教育对参加选民登记概率的提升作用变得不再显著，表明高等教育的正向影响至少有一部分来自于其有助于收入的提高。此外，年龄对青年参加选民登记的概率有显著的影响，年龄越大参加选民登记的概率就越高。本地出生的青年参加选民登记的概率要高于非本地出生的青年。模型4中男性参加选民登记的概率要高于女性，但这一影响在模型7中并不显著。

¹ 几率比 $1.53=\exp(0.428)$ ，此后类同。

表4 澳门青年参加选民登记的模型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固定效应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截距	0.874*** (0.172)	0.799*** (0.160)	0.705*** (0.229)	-6.848*** (1.699)	0.811*** (0.107)	0.830*** (0.187)	-6.802*** (1.520)
个人层次变量							
男性				0.247* (0.142)			0.0765 (0.136)
年龄				0.167*** (0.0391)			0.158*** (0.0375)
本地出生				0.352** (0.175)			0.447*** (0.170)
已婚				-0.204 (0.177)			-0.198 (0.171)
收入对数				0.268 (0.175)			0.309* (0.158)
高等教育（以受过理工科专业高等教育为参照）							
没受过高等教育	-0.428* (0.228)		-0.101 (0.249)	0.243 (0.268)		-0.415* (0.231)	-0.122 (0.250)
文科专业	0.0314 (0.186)		0.158 (0.200)	0.342 (0.215)		0.0761 (0.188)	0.166 (0.204)
随机效应							
社会分层或社会流动效应							
rho 值		0.3133	0.0861	0.0917	0.0197	0.0132	0.0329
个案数	1,291	1,176	1,176	1,116	1,250	1,250	1,173
组数	--	5	5	5	3	3	3
df	3	2	4	9	2	4	9
Log likelihood	-788.81	-705.82	-704.69	-648.15	-763.92	-759.87	-691.16
AIC	1583.614	1415.644	1417.386	1314.306	1531.844	1527.73	1400.324
P 值 (test of rho=0)	--	0.000	0.0001	0.000	0.1578	0.2396	0.0880

*** p<0.01, ** p<0.05, * p<0.1

表 5 是澳门青年参加民间组织的模型结果。模型 1 的一元回归结果显示, 教育对澳门青年参加民间组织有显著影响, 受过理工科专业高等教育的青年参加民间组织的概率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青年的 1.57 倍, 文科和理工科专业教育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即高等教育会显著地提高青年参加民间组织的概率, 同时假设 7 在青年参加民间组织上没有得到验证。模型 2 和模型 5 分别为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效应的两层完全无条件模型。模型 2 显示社会分层解释的方差是 0.0283, rho 值为 0.0085。模型 5 显示社会流动状态差异解释的方差很小。

表 5 的模型 3 和模型 6 加入了关于教育的变量, 模型 3 显示加入社会分层的变量后, 教育对参加民间组织概率的提升作用变得不再显著, 表明高等教育的正向影响有一部分来自于其提高了个人进入社会上层的概率, 假设 3 在选民登记上得到了验证。模型 4 加入收入等变量后教育的影响重新变得显著, 同时收入的影响是负的。这意味着一方面教育通过提升青年的社会地位从而提高了其参加民间组织的概率; 另一方面在相同的社会阶层中, 收入越高, 青年参加民间组织的概率越低, 所以在同一阶层结构内教育会降低青年参加民间组织的概率。这里我们看到教育的作用机制比我们假设的更为复杂。此外, 澳门本地出生的青年参加民间组织的概率要显著地低于非本地出生的青年。

表 5 澳门青年参加民间组织的模型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固定效应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截距	-0.862*** (0.170)	-0.784*** (0.123)	-0.885*** (0.200)	5.421*** (1.653)	-0.746*** (0.0603)	-0.895*** (0.173)	5.968*** (1.498)
个人层次变量							
男性				0.0671 (0.136)			0.0152 (0.131)
年龄				-0.0477 (0.0377)			-0.0434 (0.0365)
本地出生				-0.533*** (0.170)			-0.460*** (0.166)
已婚				-0.100 (0.172)			-0.0741 (0.167)
收入对数				-0.462*** (0.172)			-0.528*** (0.158)
高等教育（以受过理工科专业高等教育为参照）							
没受过高等教育	-0.453* (0.246)		-0.359 (0.265)	-0.567** (0.280)		-0.437* (0.251)	-0.700*** (0.266)
文科专业	0.236 (0.184)		0.215 (0.195)	0.105 (0.207)		0.275 (0.186)	0.122 (0.198)
随机效应							
社会分层或社会流动效应		0.0482	0.0283	0.0437	3.52e-13	4.78e-16	0.0022
rho 值		0.0145	0.0085	0.0131	3.52e-13	---	0.0006
个案数	1,301	1,186	1,186	1,126	1,259	1,259	1,182
组数	---	5	5	5	3	3	3
df	3	2	4	9	2	4	9
Log likelihood	-810.141	-743.687	-739.356	-688.742	-790.818	-783.073	-723.596
AIC	1626.284	1491.374	1486.712	1395.485	1585.637	1574.146	1465.193
P 值 (test of rho=0)	---	0.001	0.026	0.011	1.0000	1.0000	0.4040

*** p<0.01, ** p<0.05, * p<0.1

表6 澳门青年间接表达意见的模型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固定效应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截距	-2.303*** (0.271)	-2.522*** (0.210)	-2.302*** (0.321)	-1.897 (3.225)	-2.529*** (0.108)	-2.358*** (0.280)	-3.378 (2.740)
个人层次变量							
男性				0.115 (0.231)			0.101 (0.229)
年龄				0.0328 (0.0671)			-0.00584 (0.0662)
本地出生				-0.284 (0.285)			-0.341 (0.283)
已婚				-0.0177 (0.286)			-0.0309 (0.290)
收入对数				-0.115 (0.332)			0.139 (0.290)
高等教育（以受过理工科专业高等教育为参照）							
没受过高等教育	-1.303** (0.528)		-1.207** (0.546)	-1.188** (0.559)		-1.209** (0.533)	-1.166** (0.549)
文科专业	-0.122 (0.296)		-0.105 (0.311)	-0.0135 (0.328)		-0.0724 (0.305)	-0.0113 (0.325)
随机效应							
社会分层或社会流动效应		0.1309	0.0773	0.1173	1.66e-21	2.72e-18	6.50e-15
rho 值		0.0383	0.0230	0.0344	2.32e-08	2.15e-09	2.23e-07
个案数	1,301	1,186	1,186	1,126	1,259	1,259	1,182
组数	--	5	5	5	3	3	3
df	3	2	4	9	2	4	9
Log likelihood	-340.37	-322.23	-318.57	-305.64	-331.79	-327.58	-308.51
AIC	686.7438	648.4611	645.135	629.2713	667.5727	663.1661	635.0121
P 值 (test of rho=0)	--	0.053	0.192	0.206	1.000	1.0000	1.0000

*** p<0.01, ** p<0.05, * p<0.1

表7 澳门青年直接表达意见的模型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固定效应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截距	-2.459*** (0.289)	-2.157*** (0.0952)	-2.405*** (0.301)	-6.769** (2.672)	-2.163*** (0.144)	-2.163*** (0.144)	-5.277** (2.489)
个人层次变量							
男性				-0.154 (0.203)			-0.159 (0.199)
年龄				0.00249 (0.0582)			-0.0155 (0.0567)
本地出生				0.0411 (0.270)			-0.0731 (0.259)
已婚				-0.112 (0.255)			-0.0574 (0.249)
收入对数				0.436 (0.280)			0.344 (0.262)
高等教育（以受过理工科专业高等教育为参照）							
没受过高等教育	-0.426 (0.435)		-0.416 (0.444)	-0.218 (0.464)			-0.288 (0.454)
文科专业	0.419 (0.306)		0.385 (0.319)	0.451 (0.341)			0.433 (0.327)
随机效应							
社会分层或社会流动效应		1.12e-15	1.92e-20	3.54e-20	0.0335	0.0335	0.0267
rho 值		2.74e-07	2.62e-08	9.66e-09	0.0101	0.0107	0.0080
个案数	1,301	1,186	1,186	1,126	1,259	1,259	1,182
组数	--	5	5	5	3	3	3
df	3	2	4	9	2	2	9
Log likelihood	-422.75	-395.13	-391.42	-372.39	-413.05	-413.05	-389.11
AIC	851.5065	794.253	790.8324	762.7812	830.1053	830.1053	796.2235
P 值 (test of rho=0)	--	0.497	1.0000	1.0000	0.100	0.097	0.160

*** p<0.01, ** p<0.05, * p<0.1

表 8 教育对青年直接表达意见影响模式的群体差异¹

社会分层						社会流动		
高薪雇 主、机构 行政人员 及专业人 员	非高薪雇 主、机构 行政人员 及专业人 员	高薪雇员 及自雇人 士	服务性行业 雇员	非技术工 人		阶层地位 不变	阶层地位上 升	阶层地位 下降
高等教育（以受过理工科专业高等教育为参照）								
没受过高等教 育	0.0486 (1.365)	0.981 (0.723)	-1.112 (0.874)	-- --	-- --	0.343 (0.937)	0.0220 (0.623)	-1.444 (1.235)
文科专业	-0.660 (0.705)	0.618 (0.544)	0.312 (0.686)	-- --	-- --	1.424* (0.746)	-0.0559 (0.454)	0.488 (0.727)
高等教育（以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为参照）								
理工科专业	-0.0486 (1.365)	-0.981 (0.723)	1.112 (0.874)	-- --	-- --	-0.343 (0.937)	-0.0220 (0.623)	1.444 (1.235)
文科专业	-0.709 (1.329)	-0.363 (0.532)	1.424** (0.653)	-- --	-- --	1.082* (0.620)	-0.0778 (0.493)	1.932* (1.070)

*** p<0.01, ** p<0.05, * p<0.1

表 6 是澳门青年间接表达意见的模型结果。模型 1 的一元回归结果显示，教育对澳门青年间接表达意见发生的概率有显著影响，受过理工科专业高等教育的青年间接表达意见行为发生的概率是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青年的 3.68 倍，文科和理工科专业教育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即高等教育会显著地提高青年间接表达意见发生的概率，同时假设 7 在青年参加间接表达意见上没有得到验证。模型 2 和模型 5 分别为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效应的两层完全无条件模型。模型 2 显示社会分层解释的方差是 0.1309，rho 值为 0.0383。模型 5 显示社会流动状态差异解释的方差很小。

表 6 的模型 3 和模型 6 加入了关于教育的变量，结果显示教育对间接表达意见行为发生的概率依然有显著的影响。模型 4 和模型 7 加入了年龄、性别、出生地、婚姻状况、收入等变量。结果显示上述这些变量对青年间接表达意见行为发生的概率没有显著影响。

表 7 讨论的是各种结构性因素对澳门青年直接表达意见行为的影响。从结果上看，模

¹ 模型控制了性别、年龄、出生地、婚姻状态和收入，由于篇幅原因没有列出控制变量的系数。

型中各个自变量的影响均不显著。为了验证假设 5 和假设 6, 表 8 根据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状态将青年分成不同的群体, 然后考察在各个群体内教育对直接表达意见行为的影响。由于样本量太少, 不能通过回归方程模拟在“服务性行业雇员”和“非技术工人”两个群体中教育的影响, 故无法验证假设 5。但在主观认为自己阶层地位不变和下降的青年群体中, 受过文科高等教育的青年直接表达意见行为发生的概率要显著地高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 假设 6 得到了验证。同时在这两类群体身上, 可以看到文科专业教育对青年参与激进政治行为的促进作用要显著地高于理工科专业, 假设 7 得到了验证。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分析澳门青年指标 2016 社会调查的数据, 研究了社会分层与流动、教育对澳门青年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主要结论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 澳门青年政治参与行为存在明显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差异。处于社会上层以及社会流动状态较好的青年, 各类政治参与行为发生的概率都要高于其他青年群体。而处于社会下层以及认为自己阶层地位下降的青年, 只是在激进政治参与行为上有更高的发生概率。处于社会中间层的青年参与政治行为的概率要明显地低于其他群体。

第二, 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因素对不同类型的政治参与行为影响是不一样的。在选民登记、参与民间组织、间接表达意见这三类行为上, 社会分层的解释能力强于社会流动; 而在直接表达意见行为上, 社会流动的解释能力更强。换句话说, 青年在直接表达意见行为上的差异更多是由其对自身地位的主观判断而非客观阶层状态所决定的。郑宏泰通过定性访谈资料也得出相似的结论, 认为对社会流动机会的主观认识是社会运动的动因(郑宏泰, 2016)。

结合上述两点, 可以看到资源和态度对澳门青年激进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以往研究强调向下流动和不满是青年社会运动产生的主要原因, 这能够解释社会流动状态不佳的青年直接表达意见行为发生的概率不低于社会流动状态较好的青年, 但我们不能据此认为在激进行为上前者比后者有更高的发生概率。已有研究可能忽视了资源在其中的作用, 如郑宏泰(2016)的研究注意到成功组的青年有更积极的政治参与, 但认为在激进社会运动上悲观组的青年发生的概率更高。本文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即使在直接表达意见行为上, 社会阶层地位较高以及社会流动状态较好的青年其参与的概率都不低于其他青年群体, 原因并不在于他们比其他青年群体更加不满或悲观, 而可能是因为他们拥有更多的行动资源(如更多可支配的时间)。这提醒我们在分析港澳青年运动的时候或许需要重新重视资源所起的作用。

第三，教育存在多重影响机制，主要通过社会分层和收入两个因素提升或降低相应政治参与行为发生的概率。在选民登记上，我们看到高等教育的促进作用有一部分来自于其提升了个人进入社会上层的机会；在参加民间组织上，教育一方面通过提升社会地位提高青年参加民间组织的概率，另一方面又通过收入的影响机制降低了青年参加民间组织的概率。

从整体上看，教育促进了青年的政治参与。对于选民登记这类体制内的政治参与行为，教育主要是通过提升青年的社会地位来提高其参与的概率。对于体制外和激进的政治参与行为，更多是由于教育期望回报的落空所导致的。教育制度自身因素导致的差异虽然在整体上并不显著，但在直接表达意见行为上，对主观认为阶层地位下降的青年影响还是显著的。

本文的开头指出，港澳地区青年社会运动是近年来港澳研究的热门话题，许多研究者都对此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应对方案。但我们应该看到，相当一部分研究都是集中讨论单一因素对青年社会运动的影响，提出的因果机制可能是不完备的，那么据此得出的应对策略也可能存在偏差。举例来说，许多论者提出通过增加青年的收入、改善青年的就业环境等措施来降低青年参与激进政治行为的可能性。但本文的研究发现，社会阶层地位较高的青年直接表达意见行为发生的概率并不比社会阶层地位低的青年低，提高收入对降低这部分青年参与激进政治行为可能没有太多的作用。

又如有关港澳教育体系的分析，我们看到教育是存在多重影响机制的，对不同群体的影响也是不一样，因此对教育的影响做单一的定性是不恰当的。对社会阶层地位较高的青年群体来说，教育作为一种资源促进政治参与，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我们应该通过引导其更多地参与到制度化的政治活动，从而降低其发生激进政治参与行为发生的概率。

参考文献：

- [1] 陈丽君，2014，《香港同胞中国国民意识变化探析》，《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第2期。
- [2] 亨廷顿，1989，《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
- [3] 黄湛利，2009，《港澳政府咨询委员会制度》，广东人民出版社。
- [4] 李颖晖，2015，《教育程度与分配公平感：结构地位与相对剥夺感视角下的双重考察》，《社会》第

1 期。

[5] 李强, 2011, 《社会分层十讲(第二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6] 黎熙元, 2008, 《梦想与现实: 香港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北京大学出版社。

[7] 刘争先, 2014, 《两类国家认同的分殊、整合与教育——以香港人的国家认同问题为中心》,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5 期。

[8] 刘兆佳, 2015, 《香港“占中”行动的深层剖析》, 《港澳研究》第 1 期。

[9] 吕大乐、黄伟邦, 1998, 《香港阶级分析: 回顾与前瞻》, 载于吕大乐、黄伟邦编: 《阶级分析与香港》, 香港青文书屋。

[10] 吕大乐, 2007, 《四代香港人》, 香港: 进一步多媒体有限公司。

[11] 吕大乐, 2013, 《这么近, 那么远: 机会结构之转变与期望的落差》, 《港澳研究》第 1 期。

[12] 熊美娟, 2016, 《信任的度量: 澳门居民政治信任的实证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3] 涂敏霞、王建估、萧婉玲、谢美玲, 2014, 《港澳青少年国家认同研究》, 《青年探索》第 2 期。

[14] 王丹凝, 2016, 《全球化框架下的香港阶层分析以及青年人对时政的看法》, 《港澳研究》第 4 期。

[15] 邢立军、徐海波, 2014, 《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和构建途径思考》, 《宁夏社会科学》第 4 期。

[16] 英格尔哈特, 2013, 《现代化与后现代化 43 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7] 赵鼎新, 2005, 《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之述评——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 《社会学研究》第 1 期。

[18] 赵永佳、叶仲茵, 2015, 《香港青年“下流”问题: 客观状况与主观感受》, 《港澳研究》第 3 期。

- [19] 郑宏泰, 2016, 《社会流动对青年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影响: 港澳台比较研究》, 香港亚太研究所研究报告。
- [20] 郑宏泰、尹宝珊, 2014, 《香港本土意识初探: 身分认同的社经与政治视角》, 《港澳研究》第 3 期。
- [21] Alsayed, Wafa. 2014. "The Impatience of Youth: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Gulf," *Survival*, 56(4):91–106.
- [22] Andy Furlong. 2015. "Unemployment, Insecurity, and Poor Work: Young Adults in the New Economy." In *Handbook of Children and Youth Studies*, edited by Johanna Wyn and Helen Cahill. Springer Singapore:531—542.
- [23] Barsoum, Ghada. 2013. "The Alignment of the Policy Objectives of Youth Inclusion and Population Regulation in Post Arab-Spring Egyp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33(7/8):410–25
- [24] Bellei, Cristián, Cristian Cabalin, and Victor Orellana. 2014. "The 2011 Chilean Student Movement against Neoliberal Educational Policies,"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39(3):426–40.
- [25] Chiu Stephen W. K., 2015, "Social Attitudes of the Youth Population in Hong Kong: A Follow -up Study", A Report Submitted to Central Policy Unit, HKSAR Government.
- [26] Clarke, Killian. 2013. "Aish, Huriyya, Karama Insaniyya: Framing and the 2011 Egyptian Uprising,"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12(2):197–214.
- [27] Guzman-Concha, Cesar. 2012. "The Students' Rebellion in Chile: Occupy Protest or Classic Social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11(3–4):408–15.
- [28] Haveman, Robert and Timothy Smeeding. 2006. "The Rol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Social Mobility," *The Future of Children*, 16(2):125–50.
- [29] Helen Stokes, Sanna Aaltonen, and Julia Coffey. 2015. "Young People, Identity, Class, and the Family." In *Handbook of Children and Youth Studies*, edited by Johanna Wyn and Helen Cahill. Springer Singapore:259—278.

- [30] Lam S-F ,Chiu C-Y ,Lau Y-M ,Chan W-M ,& Yim P-S. 2010, "Managing intergroup attitudes among Hong Kong adolescents: Effects of social category inclusiveness and time pressure."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 2010 , 9 (1) :1-11
- [31] Matthiesen, Toby. 2012. "A 'Saudi Spring?': The Shi'a Protest Movement in the Eastern Province 2011–2012,"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66(4):628–59
- [32] Shafiq, M. Najeeb, Jessica Mason, Taylor Seybolt, and Kristin DeLuca. 2014. "Are Student Protests in Arab States Caused b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Grievance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2006–07 Arab Barometer," *Peabody Journal of Education*, 89(1):141–58.
- [33] Wong, Ka-ying and Po-san Wan. 2009. "New Evidence of the Postmaterialist Shift: The Experience of Hong Ko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92(3):497–515.

Study on the Youth'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Macao: A Perspective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Social Mobility and Education

LONG Hai-han

(School of Sociology & Anthropology i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The key issue of this paper is how social stratification, social mobility and education affect the youth'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Macao.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2016 Macau Youth Indicators Social Survey,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was obvious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differences in the youth'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different type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rough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education has multiple effects on the youth'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Key word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 social stratification ; social mobility ; education

收稿日期：2017-10-20

作者简介：龙海涵，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博士研究生。